

30 1978
2008

改革开放研究丛书

30 年

中国对外关系转型

1978-2008

*Transformation of Foreign Affair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China, 1978-2008*

王逸舟/主编

中国对外关系转型30年

1978-2008

*Transformation of Foreign Affair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China, 1978-2008*

王逸舟/主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总 序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今年，在我们纪念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我们可以像孔子一样，非常有信心地说中国是真的“三十而立”了，尽管今后的路还很长，中国仍要“志于学”。

想要了解世界在过去30年中发生的变化，我们需要研究中国发生了哪些变化。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在经济发展方面取得的成就无论对中国还是对世界而言，都是史无前例的。回首过去，即便是最乐观的改革拥趸者们也会吃惊于中国发展的步伐和规模。中国国内曾经敦促中国赶超英国的有关人士也惊奇地发现，他们的国家已经在国际贸易方面赶上了美国。30年前，国外的很多经济学家曾预言日本是最具有发展潜力的国家，那个时候，他们绝不会想到，中国在几十年中会取代日本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火车头。

在此之际出版这套丛书，其首要目的是对中国在过去30年发生的变化做一个全面综述。在这30年当中的大部分时间里，福特基金会有幸亲历和亲睹了中国的发展变化。20世纪80年代，福特基金会启动了它在中国的第一个资助项目——资助中国学生和学者到国外学习和研究。从那时起，基金会就为中国杰出的研究人员、有才干的政府官员以及坚定的社会和文化工作者们提供资助，以推动国际合作与交流，推动中国的改革开放。2007年，为了纪念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时任基金会首席代表华安德先生邀请中国知名研究人员和专业人士一起编写这套丛书，内容涵盖基金会这些年资助过的九个领域。这套丛书意义非凡，展现了中国自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以来所走过的路程。

本丛书的第二个目的，是汲取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经验，为中国未来的发展厘清方向。如果把中国今天的发展和繁荣与“文化大革命”后期的情况作比



较,我们有一切理由为此感到骄傲,但许许多多专业人士和研究人们不满足于此,他们希望知道中国在经济改革中的成功是否可以转化到其他有需求的领域,如法律、行政或治理改革。

作者们的评价和结论都是各持己见。一方面,经济学家们有足够的理由来庆祝,因为中国所取得的成就远远超过了其既定目标;放眼未来,他们还要向更高的目标奋斗。另一方面,社会、法律和行政学专家们则刚刚开始界定衡量进行法治和治理改革所需的目标和指标。

本丛书的第三个目的,是让世界关注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世界不仅需要了解中国,而且要给中国了解全球化创造空间。国外发表了很多关于中国改革经验的杰出实证研究,但迄今为止,从更广阔的理论或者普遍的意义而言,中国的经验并没有给国际学术界留下深刻印象。这套丛书将促进国际社会更加全面地理解中国改革开放 30 年来发生的巨变,也有助于加强有关中国这 30 年在世界历史当中的重要意义的比较性和理论性研究,同时有助于在未来几十年里更准确地评价中国在世界中的作用。

最后,到目前为止,中国尚未有一个综合的研究领域可以把 30 年改革开放所涉及的所有领域——经济、社会、文化、法律、行政、政治、外交、教育、环境及健康等——都整合在一起,为过去所取得的成就和未来发展所面临的挑战提供一个综合的回顾和展望。这套丛书是迈向这个方向的第一步,它试图把各领域的丰富经验和专家声音集中在一起。

没有编者、作者以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不懈努力,这套丛书不可能得以出版。在此特别感谢本套丛书的编者、作者,感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社长谢寿光先生和他能干的同事,同时也要感谢福特基金会北京办事处的同事们。

福特基金会北京办事处首席代表费约翰

2008 年 9 月 11 日于北京

作者简介

王逸舟（导论）

王逸舟，1957年生，法学博士，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副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世界经济与政治》杂志主编。已出版专著10余部、300多万字，代表作有《当代国际政治析论》、《西方国际政治学》、《全球政治和中国外交》等。主持完成“中国与国际组织关系研究”、“中国与非传统安全”等重大科研项目。曾到过近40个国家及地区讲学和访问，目前主要研究方向是中国外交与国际关系理论。

张蕴岭、周方银（第一章）

张蕴岭，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学部委员，国际研究学部主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亚太学会会长，1994~2007年（8月）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所长。1992年被国务院授予“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1999~2001年担任“东亚展望小组”成员，2001年担任中国与东盟合作官方专家组成员，2004~2006年担任由东亚13个国家专家组成的“东亚自由贸易区可行性研究”专家组组长。主要代表专著有《亚洲现代化透视》（2001）、《东亚区域主义与中国》（2005，英文）、《中国与周边国家——构建新型伙伴关系》（2008）。

周方银，1971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副研究员，任Oxford University Press出版的学术期刊*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编辑。1992年在华中科技大学获经济学学士学位，1998年在国际关系学院获法学硕士学位，2006年在清华大学获国际关系博士学位。著有《国际问题数量化分析》（2001）、《东亚安全合作》（合编，2004），在《中国社会科学》、《世界经济与政治》、《国际政治科学》等刊物上发表论文数十篇。



刘鸿武（第二章）

刘鸿武，1958 年 8 月生于云南省西双版纳，在丽江度过了青少年时代。毕业于武汉大学和云南大学。1990 年尼日利亚拉各斯大学留学回国后在云南大学组建非洲研究中心，1994 年破格晋升副教授、1997 年破格晋升教授，已培养 30 多名非洲研究博士生、硕士生和留学生。2007 年到浙江师范大学组建中国高等院校首个非洲研究院并任执行院长。兼任中国非洲史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亚非学会理事、中国中东学会理事、云南大学非洲研究中心主任。

陶文钊（第三章）

陶文钊，1943 年 2 月生于浙江绍兴。1964 年 7 月毕业于杭州大学外语系，随即进入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近代史研究所工作，直至 1993 年。1982 年 10 月至 1984 年 10 月作为国家公派学者在美国乔治城大学等处访学，1993 年下半年在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等处作学术访问。1994 ~ 2003 年任美国研究所副所长、中华美国学会秘书长。现任美国研究所研究员、中美关系史研究会会长。主要著作有《中美关系史》（1911 ~ 2000）（三卷本）、《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对外关系》，编有《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 ~ 1972）（三卷六册）。

庞森（第四章）

庞森，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曾任中国外交部国际司处长、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团参赞、军控司副司长。2000 年进入联合国监督、视察和核查委员会担任高级活动评议官，现任中国联合国协会副会长兼总干事、联合国协会世界联合会执行委员会主席。主要著作有《当代人权 ABC》、《走进联合国》、《与布利克斯共事》等。

周弘（第五章）

周弘，1952 年 10 月出生，1975 年毕业于南京大学德语专业。曾在中共中央马恩列斯编译局工作。1979 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哲学系。1986 年转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西欧研究所工作。1992 年获得美国布兰代斯大学比较历史学博士学位。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国际学部副主任兼欧洲研究所所长。主要著作有《福利的解析》、《欧洲文明扩张史》（合著）、《国外社会福利制度》



(主编)、《对外援助与国际关系》(主编)、《中欧伙伴关系——差异与共性》(主编)、《欧洲模式与欧美关系》(合著)、《福利国家向何处去》、《外援在中国》(合著)、《中欧关系:认知、政策与前瞻》(合编)、《欧盟治理模式》(主编)等。

杨毅 (第六章)

杨毅海军少将,1949年9月21日出生于天津,1968年2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历任海军航空兵机械师、中国援外军事专家、护卫舰副舰长、海军司令部办公室外事处处长、海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中国驻美国大使馆海军武官、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等职务。毕业于北京大学,先后在加拿大拉瓦尔大学、法国政治大学、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和国防科技大学进修学习。主要学术著作有《全球战略稳定论》、《国家安全战略研究》、《国家安全战略理论》等。

余潇枫 (第七章)

余潇枫,哲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哈佛大学、牛津大学访问学者。中国高校国际政治研究会常务理事、浙江大学非传统安全与和平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全球领导力研究中心主任。2000年入选浙江省“151人才工程”第二层次。出版著作有《哲学人格》、《非传统安全概论》、《非传统安全与公共危机治理》、《人格之境:类伦理学引论》、《比较行政体制》、《国际关系伦理学》、《公共危机管理》、《浙江模式与地方政府创新》等。

苏长和 (第八章)

苏长和,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外交事务研究院常务教授、院长。1999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获法学(国际关系)硕士与博士学位。1999~2006年任教于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国际政治系。出版专著有《全球公共问题与国际合作:一种制度的分析》、《21世纪全球政治范式研究》,编有《美国、俄罗斯与中国:打击恐怖主义与21世纪的全球安全挑战》等书,发表中英文论文30余篇。



蔡拓 (第九章)

蔡拓, 1947 年生于安徽淮南。哲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全国高校国际政治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政法大学全球化与全球问题研究所所长。主要研究领域为全球化与全球问题、国际关系理论、政治学理论。主要著作有《全球化与政治的转型》、《当代全球问题》、《全球问题与当代国际关系》、《契约论研究》、《西方政治思想史上的政体学说》、《可持续发展——新的文明观》等, 译著有《古希腊政治学说》。

秦亚青 (第十章)

秦亚青, 外交学院教授, 美国密苏里大学政治学博士。主要研究领域为国际关系理论、社会科学方法论、中国外交, 有相关著述多项。专著有《霸权体系与国际冲突》、《权力·制度·文化》等。翻译过国际关系经典著作罗伯特·杰维斯的《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亚历山大·温特的《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等。担任东亚研究中心执行副主任、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副会长、联合国《全球治理》杂志编委, 美国东西方中心政策研究系列国际编委、联合国名人小组研究队成员、中国—东盟名人小组中国名人特别助理等职务。

目 录

作者简介	/ 001
导论	/ 001
第一章 中国与邻国的关系	/ 026
第二章 中国与非洲的关系	/ 052
第三章 中国与美国的关系	/ 084
第四章 中国与联合国的关系	/ 114
第五章 中国新的对外援助	/ 139
第六章 中国的国防现代化	/ 178
第七章 非传统安全与中国	/ 208
第八章 中国地方的国际化	/ 240
第九章 全球化观念在中国	/ 266
第十章 中国国际关系理论	/ 306
全书索引	/ 344
后记	/ 358

导 论

2008 年是中国启动改革开放进程的第 30 个年头。不管从什么角度观测，过去 30 年在这个国家发生的一切，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具有重大意义的变化。传统的、高度集中和指令性的苏联模式，为新型的、富有竞争性和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体制所取代。占当今全球人口 1/5 的中国人民，用勤奋和富有效率的劳动，在新体制的激励下彻底解决了长期悬而未决的温饱问题，成为世界上最有活力的庞大群体，一举扭转了近代以来被外界蔑称的“东亚病夫”形象。在强大和持续的经济驱动力支配下，中国经济创造了连续 30 年年均近 10% 的增长率，人均所得从不到 300 美元提高到近 3000 美元，提供了世界上最大、也是增速最快的新兴市场，成为经济全球化浪潮中公认的最大受惠者和出色冲浪者。以此为前提和基础，中国的政治、社会、文化、教育、科技、体育、传媒等领域乃至城乡面貌和人的观念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积极改变。例如，中国的政治体制尽管保留了传统的构造，但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无论在自身指导思想、行动纲领还是具体管理与行为方式上，都出现了适应时代特点和中国现阶段国情的深刻而持续的调整变化，执政理念和执政方式更加灵活、更富有人性，也更适合新的经济发展氛围和民众消费愿望；可以说，同样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中国与朝鲜就有本质的不同，自然不必说中国与西方的政治制度依然保持着重大的分野（或对峙）。又如，在新的经济政治体制下，中国社会变得更有生机、层次更加丰富，其弹性、延展性和抗危机能力从而都大大增强；旧式的阶级划分标准已完全无法适用于界定今日生动多样和动感十足的阶层群体及利益差序结构。再如，在中国的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不止可以看到通俗性、大众性的市民社会文化与党的指导思想、政治教育等政治文化并存，即便在政治性层面也能明显观察到意识互动和导向的多元性，如同所谓的“中”（即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延续）、“西”（即近代以来欧美思想文化的影响）、“马”（即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及其传播)三足鼎立说描述的那样。从根本上讲,经过 30 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国内各种体制从旧时的适应革命与战争年代的形态,转向了适合和平与发展年代及经济全球化要求的形态,转向了极具特色和灵活性的政治体制、经济机制、社会形态、文化结构和思想结构。这种转型仍在继续中,未来的路途仍然漫长,其间包含的不确定性和受挫的可能性并不能完全排除,但人们有理由相信,这一历史转型还保持着强劲的动能。

本书探讨的主题,是中国对外关系的转型,它与中国内部发生的改变是密不可分、相辅相成的。从国际角度看,伴随着中国国内各方面的历史性转型与发展进程,尤其是伴随着经济重心的确立和市场化进程的迅猛推进,中国的对外关系领域也出现了极其深刻的变化,外交和国际战略及相关研究领域发生了持续而重大的转型。经过几十年的持续增长,中国经济社会已俨然是世界新的一极(尽管 GDP 总量与超级大国美国相比还有很大差距),世界前三甲的经济大国位置为中国在国际政治和外交舞台施展新作为奠定了基石。在外部压力和内部变革的双重因素驱动下,中国对外关系的表现形态不断调整、更新和自我完善,适应着新的形势与要求。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以及世界大国的含金量不断提高,中国在亚太地区和全球的影响力日益上升,中国独特的发展方式和探索道路的价值越来越被各方面看重。2008 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以艺术的形式生动展示了中国的这种气势与信心。不过,我想特别指出的一点是,迄今为止,中国力量、中国声音和中国影响的主要来源,是其迅速壮大的经济实力,是占世界人口 1/5 的中国民众强烈的消费欲望,是这个国家尚未成熟但极具潜力的市场容量,以及这一切在全球经济中扮演的“四两拨千斤”的特殊角色。这是观察中国整幅画面的基本出发点,是理解当代中国政治、社会及观念转型的“窍门”,也是分析中国对外关系各个方面巨大变化的前提。它像一枚硬币的两面,既是力量、也是弱点,既包含令国人骄傲的优点,也带有不可小觑的问题;尤其从对外关系角度看,如同下文将要讨论的那样,它给中国带来的绝不止是机遇,同样还有未能预期的各种压力与挑战。

下面将具体说明中国对外关系转型的各方面内涵。这里,对外关系即“外交”,它是统称,指一个国家广义的对外联系与事务,即英文中的“foreign affairs”。它包括了狭义的“外交”(diplomacy)(外交部门的体制与操作),但范围更加宽泛,包含了外交体制、外交思想、国际交往、国际战略、国际观念,等



等。研究中国对外关系的转型，可以有不同的途径和角度。本书采用广义的视角，聚集不同作者的智慧与专业，从十个领域（方面）透视中国对外关系的这种历史性变迁；虽然不可能涵盖全部，但在我看来，它们也许代表着中国转型期的最重要内容，使当代中国外交及整个对外关系显得丰富多样和动感十足。

第一，从与邻国和周边地区的关系看，中国对外关系的转型表现为：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几十年间，依据“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及“周边为首要”等指导思想，中国对邻国及周边地区的态度和做法，由过去政治意识形态标准高于一切、敌友关系泾渭分明的思维形式与行为模式，逐步转变为努力同所有邻国建立友善与合作关系、妥善处理各种棘手难题的新形态和新实践；简言之，旧的类似冷战的模式被新的睦邻友好的方针所取代。

众所周知，中国是当今世界邻国最多的国家之一，中国的周边关系也是现今国际政治中最复杂多样的形态之一。由于一言难尽的历史和现实原因，在近三十个大大小小的邻国中，竟有近一半曾与中国发生过主权纠纷甚至武装冲突，至今仍然有近十个国家同中国存在着围绕陆地边界、领海和经济区及各种岛礁、大陆架归属等问题的争议。历史上，中国与各个邻国的关系既有和谐相处、共荣共进的美好阶段，也不乏剑拔弩张、残酷争斗的不幸事件。在新中国成立直到改革开放前的近三十年间，在特殊的国际国内政治氛围导向下，虽然有外交部门和周恩来同志个人的友善努力，但总体上中国与周边区域的关系是比较紧张的。表现为：中国与部分邻国没有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主权与安全问题始终没有根本缓和；经济贸易和人员往来不仅数量少，而且严格服从服务于政治意识形态方针；“敌”或“友”的划线一直存在。朝鲜、越南及印度支那地区被视为中国外交和军事的主要“盟区”之一，而日本、韩国及东南亚一些国家被看成对敌国家或潜在的遏制范围，苏联及“卫星国”蒙古等在不同时期被当做主要战友或主要威胁，与南亚主要大国印度、巴基斯坦的关系恰似“冰火两重天”。尤其是在国内“文化大革命”等极“左”气氛盛行的年代，中国人的被包围感和焦虑感极为明显，很多人心底存在着强烈的“解放他人”和“输出革命”的意识。改革开放之前的几十年间，中国军队先后在朝鲜半岛、印度支那、中印边界和中苏边界等地投入大规模作战和备战的力量；必须承认，这既有保家卫国、维护主权和自我生存的重大考虑，也有革命性政治意识形态输出和对国际形势总体严峻判断促成的实际行动。



从邓小平同志 1978 年执掌中国航船以后，整个形势开始向着改善、调整和充实的方向发生积极变化，随着中国国内改革开放的逐步推进，中国与周边关系也呈现不断拓展和深化的良好态势。正像本书第一章详细叙述和分析的那样，这一关系在 20 世纪 80 年代的特点是：中国与多数邻国的关系得到改善（无论是邦交国还是非邦交国），经贸关系成为推动这一变化的重要纽带；中国总体外交在这一时期出现的新气象，即倡导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不与任何大国或大国集团结盟（或对抗）的立场，极大地促进了中国与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的各种邻国的关系全面改善。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至 90 年代初期冷战格局的结束，对于中国与邻国关系产生了新的推进作用。旧的集团分野和对抗氛围淡化了，经济全球化和地区内部合作的意愿加强了，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国际组织和多边主义得到迅猛发展；所有这些因素有助于强化中国与邻国和整个亚太区域在 80 年代业已改进的关系，并朝着更高的标准和更广的领域迈进。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中国与所有周边国家实现了关系正常化，建立起形式多样、互惠互利的睦邻关系。邓小平同志积极推动了中苏关系（包括后来的中俄关系）的实质性改善，从而抓住战略机遇大大提升了中国和平发展、全力搞好国内建设的氛围层次；通过他对日本的访问，历史性地将中日关系提高到一个真正正常的大国间关系的水平（包括他对中日之间尚未解决的钓鱼岛问题等主权纠纷的著名论断，确立了后来中国外交部门解决与邻国主权纷争的总体思路）。上海合作组织的建立，标志着中国与俄罗斯及中亚新独立的各国关系发展的新阶段，即在打击分裂主义、恐怖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三股势力”等领域的自主性国际制度建设进入了深化期。中国与韩国的建交，并没有以损害其同朝鲜的传统友谊为代价，相反，却大大促进了半岛转向后冷战格局的进程及整个东北亚地区安全框架的有利变革。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中国与南亚地区的宏观联系上：中国在保持与巴基斯坦“全天候友好关系”的基础上，努力改进了与曾经的手——另一个发展中国家——印度的关系。不用说，中国在这一时期与东盟各国的关系，也进入了前所未有的新阶段：从“十加一”的经贸一体化协定，到东南亚友好条约的签订及东南亚无核区倡议的认可，及至互信互利、共同安全的新安全观的倡导，均反映出各方已经从曾经的假想敌和遏制对象转变成新型的全方位战略合作伙伴。从外交决策层到专家学者的普遍判断是：最近的这十多年，中国与邻国的关系经历了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最好的一个时期。从学术研究方面也不难注



意到，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对邻国关系的认识和定位同样有一个逐渐深化的过程：直到冷战结束之前，邻国关系和周边方针还只是中国对外关系中一个比较重要的组成部分；1997年，也即亚洲发生金融危机和中国向邻国伸出援手的那一年，中国共产党的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明确把营造“良好的周边环境”作为总体外交政策中一个特别紧要的内容提了出来；到2002年党的十六大，首次提出“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新口号，并完整制定了“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是重要舞台”的外交总体布局，从而使周边外交的地位上升有了执政党指导性文件的背书。此外，分析近一时期与邻国交往关系可知，中国人的自信心和主动性也有一个逐渐增强的过程，体现在中国提出更多倡议、参与更多制度安排、担当更大责任等方面。例如，率先提出与东盟的自由贸易区（以下简称自贸区）协议、承当朝核问题六方会谈的东道主、与俄罗斯共同建立上海合作组织等。

自然，转型过程并非一蹴而就，中国与邻国及周边的关系也不是不存在棘手、难解的课题。如前所述，中国与多个邻国存在的主权归属矛盾，作为当今世界单个国家面临的数目最大的一类主权纠纷，无疑是中国外交将来要面对的头号难题之一；如何处理和面对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传统霸主位置，与这个超级大国建立“和而不同”、“斗而不破”的战略对话协作机制，共同应对东亚及中国周边的各种危机，更是中国领导人和外交部门不能不始终谨慎对待的大课题。还要看到，中国的崛起过程既给邻国带来机会和利益，也造成了冲击和忧虑；如何在新的形势下安抚周边、安定周边、安排周边，是中国外交前所未有的的一项任务和环境压力。无论如何，如同本书第一章结尾强调的那样：持续和成功的周边外交转型，对于中国的未来十分重要；它有助于为本国国内集中精力谋发展塑造可靠的周边环境，也可以发展为中国崛起为世界一极力量的主要支撑点与战略依托带，同时带动整个亚太地区在全球地位的提升。

第二，从与非洲及广大发展中世界的关系看，中国对外关系的转型表现为：最近30年间，在“改革、开放”的国内政策总体指导下，在新的时代认知理念导向下，中国的对非政策及对整个第三世界的方针，从原先只看重民族独立和解放理念、单纯注重政治和外交上的相互支持、经贸关系方面很少根据市场原则和互利标准行事的形态，逐渐转变为既讲政治又讲经济，既尽力保持原有的友谊与合作关系，又根据“平等务实、共同发展”的原则，在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



化的国际政治经济大背景下稳健推进的形态。

首先必须承认,中国与非洲及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自新中国建立到今天一直保持着很强的连续性和内在逻辑。这表明,中国领导人和外交官始终把自己的国家视为发展中世界的一员(虽然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仍与那些有资本主义色彩的发展中国家有一定差别,中国现在新一代年轻人的身份认同标准也在不知不觉中有所改变),在政治上与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阵营存在着难以弥合的距离感和对立意识。中国与广大发展中世界国家有着同样的历史遭遇和现实挑战,这种感同身受是凝聚长期的“准盟友”关系的重要基石,也是精确衡量中国与发展中世界关系变化不可不参照的尺度之一。不管是在毛泽东时代还是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开放时期直至现今的发展阶段,中国与非西方世界的紧密联系,始终是塑造或撬动中国与国际体系整体框架的一个重大支点。本书第二章以中国与非洲的关系为例,讲述了这种关系的历史性变迁和深刻含义。它的一个基本线索在于,追求国家复兴和民族自强以及在国际外交舞台上的相互承认与支持,从一开始就是中国在外交上缩短与非洲众多新独立国家距离的起点,是新中国外交努力的最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是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中国革命和建设领导人对外战略方针的要点之一。非洲国家在支持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问题上的不懈努力和巨大成效,使中国人有理由相信政治上的相互信任和依赖的必要。中非关系从 20 世纪 50 ~ 60 年代便包含着复杂的政治和意识形态亲疏成分,但它又不是可以用中国与苏联那样的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意识形态结构模式能够简单类比的。这些是理解改革开放之前中国与非洲关系内容(如互不干涉原则在双方关系宣言中频繁出现以及中国大量非市场性质的外援等)的关键钥匙,也是客观剖析改革开放初期中非关系某些波折的恰当切口。即便在改革开放进程走过 30 年的今日,普通中国人对于“非洲兄弟”仍然有一种难于割舍的情怀,对于昔日曾经无私援助过的那片大陆目前还广泛存在的战乱、贫困和宝贵的自然资源与独特的人文景观仍然既叹息又憧憬,中国领导人和外交官仍在观念中和(一定程度上)实践上保持着对非洲的特殊友好。

然而,人们同样不得不承认,历史毕竟在变化,时代在前进,自 20 世纪 80 年代起,中非关系进入了与此前状况大相径庭的阶段。国际环境的变化、特别是中国国内的改革开放事业,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对非洲外交及各方面工作的转型。正如第二章叙述的那样,20 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随着“和平与发展”成



为决策层对世界局势与国际格局的基本判断依据,发展经济和实现现代化转变为中国政府追求的首要目标,经济因素获得了自主的地位而不再只是服务于政治目标的工具。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开始调整对非洲经济援助的政策与方式。一是要对经济援助所追求的目标进行调整,二是要考虑提高经济援助的效益,三是要改革经济援助的方式,四是要把经济援助与中非双方的经济发展结合起来。总之,要结合中国自身能力和非洲国家的需要重新制定援非目标。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政府更明确把“平等务实、共同发展”作为对非政策调整的方向。它适应国内改革要求,将中非关系的重点由政治转向经济,将不计成本的无私援助调整为关注效益、互利共赢的可持续发展经济技术合作。冷战结束、苏联解体之后,当西方国家以悲观眼光看待非洲前景、纷纷缩减在非投资的时候,中国却因与非洲国家有着重要的战略诉求,在延续传统友好政治关系的基础上,以更加积极和长远的眼光看待非洲的发展问题,通过改革援非方式而拓展出中非经贸技术合作的新天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中非经贸关系逐年升温,中国在非洲的影响力已悄然上升,甚至超过一些西方大国,引起了世界的瞩目。尽管冷战的结束和苏联的解体也给非洲某些传统一党制国家带来冲击,中国台湾地区的“银弹外交”一度有所奏效,从而造成中国对非外交的某些困难和挑战,但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重新加强了对非外交关系,并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效。世纪之交时中非贸易额达到百亿美元,到2007年超过700亿美元,仅次于美国、法国而超过了英国,估计中国很快就将成为仅次于超级大国美国的非洲第二位贸易伙伴。政治上,2000年的中非合作论坛宣告成立,特别是2006年的中非首脑会议,标志着中非关系新阶段的到来。中国的强大开始惠泽非洲大地,非洲与中国的关系进入了新的共赢阶段;中国对外关系的转型,生动体现为改革开放后崛起的中国,用变换着的政治理念、战略方式,加上适应经济全球化的市场方式和自身经济实力,在全球发展和治理进程中带动非西方世界的传统伙伴一道前行。且不论效果如何、时间长短,在中国人眼里,这种趋向和理念是显而易见的。

中非关系仍在变化,中国与发展中世界关系的转型还在继续。这里面包含的问题与不确定性,并非此处简短的篇幅能够说清。我认为,简单地讲,最大的一个挑战和变量是,当中国逐步进入比较发达国家的行列,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和社会治理方面具有的共同点会增多,法律及制度方面的趋同性可能加强,



但全球战略方面的矛盾可能加剧，能源、气候、环保、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的磨合会变得更加艰难；也就是说，中国与西方世界的紧密度将会上升。与此同时，中国与相对不发达的非西方世界的关系，会继续处在一种摸索中调整前行的状态，某些方面的实力差距可能越来越大；在这种情形下，中国与非洲和整个发展中世界的相互需求与合作，会置于新的平台和标准之上。对于中国更加年轻的外交决策者和广大公众而言，历史记忆因素和现实利益因素的影响可能此起彼落、此消彼长。因此，能否在市场化 and 开放的大环境中保持中国与第三世界的友好关系，使之继续处于中国总体外交中比较重要的层次，无疑将是各方面关注的大课题。中国与非洲关系的变化，是中国与发展中世界关系调整的一个缩影，也是中国与国际体系关系调整的一个折射。正如我在前面提到的，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迅速恢复的强大而持续的经济驱动力，是洞察中国神奇故事全部奥秘的关键所在，也是理解外部世界的赞美、惊奇与困惑、担忧的重要路径，是看到我们自身优势与不足的一个要点。中国外交的非洲政策及对发展中世界的方针，也许是解读这一命题的最好注脚。

第三，从与西方主要大国的关系角度看，中国对外关系的转型表现为：虽然存在这样那样的矛盾与问题，尽管彼此关系发展的进程复杂曲折，总体上说，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在重大国家利益和原则问题上保持独立自主的前提下，始终承诺并坚持了不扛旗、不对抗、相互沟通与协作、和平合作发展的理念，改变了原先那种对国际形势偏“左”的、充满焦虑和对抗性的看法，敞开了与当代国际体系全方位交往的大门。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的国际形象由某种“造反派”式的被排斥主体，转变成国际社会的“参与建设者”和“负责任大国”。

本书第三章以中国对美关系为例，叙述了中国对外关系转型的重要方面。显而易见，一方作为当今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一方作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头号大国和苏联解体后唯一的超级大国，中美关系无疑是特别有代表性的案例。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对美关系，深刻反映了中国与西方世界关系拓展过程中的行进方向及曲折路径。从新中国建立到毛泽东去世，中美关系的进展曾经一波三折，经历了“隔绝与对抗”、“接触与磨合”等不同阶段。早期，美国对中国实行了长期、全面的遏制政策，中国相应采取了对苏联“一边倒”的方针；后期，双方的接触和沟通有所增加，基辛格和尼克松相继访华标志着两国正式交往的开始。然而，在改革开放之前，尽管双方认识到重大战略利害关系